

# 试论城镇女性的 教育与劳动参与之间的关系

郑美琴 王雅鹏

**摘要:**自我国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女性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发生了显著下降,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教育是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重要变量,既有促进女性参与市场劳动的一面,也有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一面。一方面教育能够增加女性的工资收入,提高女性的健康水平,增加女性的预期工作时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能够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另一方面随着女性的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议价能力也会不断提高,这又使女性乐于享受家庭生活,倾向于不参与市场劳动。

**关键词:** 议价能力 劳动参与决策 教育

## 一、引言

根据全国妇联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2000年,我国城镇女性18岁至49岁的青年女性在业率为72.0%,比1990年降低了16.2个百分点。姚先国和谭岚(2005)根据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1988-2002年的城市住户调查的数据估计,在过去的15年内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1988年,我国城镇的女性劳动参与率高达91.37%。2002年下降为83.33%,下降了8.04个百分点。对比之下,男性劳动参与率相对稳定,1988年和2002年男性劳动参与率分别为96.41%和94.11%,下降幅度为2.3个百分点。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发生显著下降的现象是我国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的重要表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教育是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一个重要变量。姚先国和谭岚(2005)利用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1988-2002年的城市住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对比1988年、1995年和2002年的回归结果后发现:教育年数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作用正在逐年变大。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主要发生在低教育水平的妇女人群中,因此,他们建议应为低文化程度的妇女人群提供有针对性的教育与培训。

如果女性和男性在参与市场劳动决策方面无差异,则教育显然是预测妇女就业的显著变量。首先,

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其人力资本存量越大,潜在的资薪能力就愈强,离职的机会成本也就愈高,从而女性全职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次,妇女教育程度越高,自我实现的意识就愈强,参与社会劳动的要求越迫切,因而劳动参与率也越高。

然而在一个妇女有从事家务劳动与市场劳动选择权的经济中,教育对妇女劳动参与的作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一定是妇女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参与率也越高。Grossbard-Shechtman和Neuman(1988)通过对以色列妇女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如果将教育对妇女的潜在资薪能力的影响考虑在内,受教育的年限对妇女的劳动力供给没有影响。这是因为妇女受教育的水平越高,她在婚姻市场上就越有竞争力,在婚姻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他们发现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妇女一般都不从事全职工作,她们从事市场劳动主要不是为了工资,而是为了享受工作本身带来的快乐。高中以下学历的妇女从事全职工作的较多。因此Grossbard-Shechtman和Neuman将他们的研究对象限制在高中以下学历的妇女这个人群。

现在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已基本建立,政府在就业中的强制作用被取消,女性个人有选择是否参与市场劳动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满足于妇女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力参与率也越高这个结论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更深入地分析教育对我国妇女劳动

参与的影响。

## 二、基本假设

为了从劳动的角度刻画两性的差别,本文将劳动分为两类:一类叫家务劳动,一类叫市场劳动。假设女性在做家务劳动方面比男性有优势,在其他方面与男性无差异,而且具有选择家务劳动与市场劳动的权利。假设一个在劳动年龄的未就业女性预期自己的寿命为  $T+1$  个时期。用  $t$  表示第  $t$  个时期,  $t=0,1, \dots, T$ 。她在  $t=0$  期规划自己是否参与市场劳动。她有两个选项,即专职从事家务劳动和参与市场劳动。如果她决定参与市场劳动,则她以失业者的身份到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如果她决定专职从事家务劳动,则她在每个时期的家务劳动的价值为  $kx$ 。其中  $x$  表示如果将家务劳动市场化,一个单位的家务劳动的市场价格; $k$  表示女性亲自从事一个单位的家务劳动的价值与该家务劳动的市场价格的比值。

假设每个在劳动年龄的未就业女性都知道自己的议价能力  $k$  与家务劳动的市场价格  $x$ 。对于不同的女性来说,她们的议价能力可能是不同的,因此,从全国来看, $k$  是一个随机变量。用  $H(\cdot)$  表示  $k$  的分布函数,即  $H(K) = \text{prob}\{k \leq K\}$ 。对每个家庭来说,家务劳动都是有用的劳动。故假设对于任何妇女来说, $k > 0$ , 即  $H(0) = 0$ 。

假设女性是效用最大的,其效用函数为  $E_{t=0}^T y_t$ , 其中  $0 < \beta < 1$  是折现因子,  $y_t$  表示一个女性在  $t$  时期的收入。

假设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岗位由企业提供,而且在给定的一个时期一个具体的工作岗位的工资是已知的,用  $w$  表示。在同一个时期经济中有许多工资不同的工作岗位,故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工资  $w$  是一个随机变量。用  $F(\cdot)$  表示  $w$  的分布函数,即  $F(W) = \text{prob}\{w \leq W\}$ 。假设个人不能无偿地为企业劳动,因此,工资小于等于 0 的概率为 0, 即  $F(0) = 0$ 。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例如,从我国全国来看,虽然在不同岗位上的工资的差别可能很大,但最高工资不可能无穷大,用  $B < \infty$  表示最高工资,即假设  $F(B) = 1$ 。

假设工资相同的工作岗位对每个女性来说是无差异的,即女性只关心其所在工作岗位的工资的高低。假设经济中的每个女性在每个时期提供一个单位的劳动,而且至多只能占有一个工作岗位。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个人之间存在许多差别,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个人之间的差别,例如,个人的工作经

历、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个人的家庭出身等等。个人失业后的收入,除了从失业保险机构领取的失业补偿外,还应该包括其从事家务劳动以及享受休闲等的价值。所有这些价值的总和就构成个人从事某个工作的机会成本。假设女性的机会成本可以用货币表示,而且女性知道自己的机会成本。用  $c$  表示一个女性的机会成本。由于不同的个人的机会成本可能是不同的,因此,从整个经济来看, $c$  是一个随机变量。用  $G(\cdot)$  表示  $c$  的分布函数,即  $G(C) = \text{prob}\{c \leq C\}$ 。假设  $G(0) = 0, G(\infty) = 1$ , 其中  $0 < \bar{c} < \infty$ 。在下面的讨论中,为了便于表述,我们不严格区分机会成本与失业补偿。

假设一个失业人员已知工资的分布  $F(\cdot)$  和失业补偿的分布  $G(\cdot)$ , 但认为这两个分布不随时间变化。

令  $v_t(w) = \max_{\text{选择}} E_{t=0}^T y_t, t=0,1, \dots, T$ 。其中  $\max$  是在每个时期当失业女性有一个在工资为  $w$  的工作岗位上工作的机会时对下列两个行动做出选择而得到的:(1) 接受工作并一直工作;(2) 拒绝工作,当期得到失业补偿  $c$ , 下期再找工作。

用  $\lambda$  表示在劳动年龄的未就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lambda$  表示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1 - \lambda$  表示女性的失业率。我们有:

$$= H\left[\frac{1}{x(1-\beta)^{T+1}} \int_0^B v_0(w) dF(w)\right] dG(c) \dots \dots \dots (1)$$

$$= \frac{1}{1 + (1-\beta)^{T+1}} \dots \dots \dots (2)$$

由(1)式、(2)式,我们知道,议价能力的分布  $H(\cdot)$ 、机会成本的分布  $G(\cdot)$ 、工资的分布  $F(\cdot)$  和家务劳动的市场价格  $x$  都影响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 三、教育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途径

### (一) 假设教育能够提高妇女的工资收入

根据世界银行在《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的估计,在初等教育阶段每增加一年学校教育时间,可以使受教育者就业后的工资增加 10% 以上,在发展中国家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庄平等(2003)的问卷调查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点,女职工受教育年限和年收入(含奖金)体现了显著的相关性,其相关系数(Pearson系数)达到 0.328, 这表明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明显地提高妇女收入。根据现有的统计资料,大专以上学历女职工年均收入分别是小学、初中、高中年均收入的 2.04 倍、1.62 倍、1.46 倍。女职工受教育年限与年均收入有明显正相关性。因此,我们假设教育提高妇女的工资收入。

我们用  $F_1(\cdot)$ 、 $F_2(\cdot)$  分别表示在两个不同时期

(例如第一个时期与第二个时期)的女性工资的分布函数。称第二个时期女性的工资收入高于第一个时期女性的工资收入,如果对任意  $C, F_1(c) > F_2(c)$ 。

命题 1: 如果教育能够提高妇女的工资收入, 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教育提高妇女的劳动参与率。

证明: 由假设, 教育能够提高女性的工资收入, 即如果第二期女性的教育水平高于第一期的教育水平, 则第二期女性的收入高于第一期女性的收入。因此, 如果用  $F_1(\cdot), F_2(\cdot)$  分别表示第一期与第二期女性的收入分布, 则对任意  $C, F_1(c) > F_2(c)$ 。

用  $v_0^1(\cdot), v_0^2(\cdot)$  分别表示与  $F_1(\cdot), F_2(\cdot)$  对应的未就业女性搜寻工作的最大收入, 则对任意  $w$ , 由对任意  $C, F_1(c) > F_2(c)$ , 我们有  $v_0^1(w) > v_0^2(w)$ 。因此:

$$\int_0^B v_0^1(w) dF_1(w) > \int_0^B v_0^2(w) dF_2(w) \dots (3)$$

用  $\alpha_1, \alpha_2$  表示与  $F_1(\cdot), F_2(\cdot)$  对应的未就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由(1)式有:

$$\alpha_1 = H \left[ \frac{1-x}{x(1-x^{T+1})} \int_0^B v_0^1(w) dF_1(w) \right] dG(c)$$

$$\alpha_2 = H \left[ \frac{1-x}{x(1-x^{T+1})} \int_0^B v_0^2(w) dF_2(w) \right] dG(c) \dots (4)$$

由女性的失业率  $< 1$  及(2)式, 我们有, 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是未就业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单调增加的函数, 故如果用  $\alpha_1, \alpha_2$  分别表示与  $F_1(\cdot), F_2(\cdot)$  对应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则  $\alpha_1 > \alpha_2$ 。故如果教育能够提高妇女的工资收入, 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教育能提高妇女的劳动参与率。证毕。

(二) 假设教育能够提高妇女的健康水平, 从而提高女性预期的工作时间

个人或家庭在健康和教育上的花费是人类自身生产过程中的投入, 是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消费支出。任何为满足人自身需要的开支, 都既是满足当前享受的消费支出, 又是为将来获益的投资。以对健康的花费来看, 它有纯消费的一面, 如一日三餐、生病就医, 它满足了人们当前的直接欲望和生活需要, 使人们感觉更好; 它也有纯投资的一面, 如卫生保健、增加营养, 它可以提高人的健康素质, 使人能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学习和生活, 以至将来长期获利或受益。这样, 健康投资可以获得两种收益: 一种是生理、心理、精神上得到满足的“消费性收益”; 另一种是劳动能力和经济收入增加的“投资性收益”。健康投资可定义为对医疗、保健、闲暇、锻炼

等服务进行投资, 以恢复、维持、改善和提高人的体力和精力, 保持健康水平, 并可为投资者带来预期收入的生产性投资。

M. 格罗斯曼认为, 教育水平高的人是更有效的健康水平生产者, 因为他们知道如何保持健康, 如何使用药品等市场消费投入和时间来生产健康, 从而会从事更多的健康保存行为。也就是说, 教育通过提高用来发展和保持个人健康投入品的生产率, 直接影响健康。健康状况的改善会刺激人们获得更多的学校教育和更多的职业经验, 以作为未来收入的投资; 并且刺激父母更多地投资于其子女的人力资本。这是因为, 通过改善健康可延长平均预期寿命, 从而延长职业生涯, 降低教育投资的折旧率, 使这些投资能在更长的时期内获得不断增长的未收益, 提高其回报率; 而寿命的延长和更加充沛的精力和体力, 再加上增加收入的可能性的加大, 使劳动者愿意更多地投资于自身的教育培训和技能训练, 带来工作数量和质量的提高。

因此, 我们假设教育能够提高妇女的健康水平是合理的。我们知道一个健康的人将会比不健康的人工作更长的时间, 所以我们假设教育能够提高女性预期的工作时间。

命题 2: 如果教育提高女性预期的工作时间, 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教育能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证明: 由定义,  $v_0(w) = \max_{t=0}^T E_t \{y_t\}$ 。由假设,  $y_t > 0$ 。故对任意  $w, v_0(w)$  是预期工作时间  $T$  的单调增加的函数。由(1)式, 在劳动年龄的未就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是  $v_0(w)$  的单调增加的函数。由(2)式及  $< 1$  知, 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是未就业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单调增加的函数, 从而是预期工作时间  $T$  的单调增加的函数。故如果教育提高女性预期的工作时间, 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教育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证毕。

(三) 假设教育能够提高女性的议价能力

许多因素影响妇女的议价能力。Grossbard-Shechtman 和 Neuman (1988) 对以色列妇女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时, 考虑了女性的年龄、在以色列居住的时间、家庭出身、夫妻双方的年龄差异、小孩的个数以及教育等对妇女议价能力的影响。他们发现教育能够提高妇女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 是提高女性议价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 妇女的主体地位、自主决策与竞争能力、生育率都是决定妇女议价能力的重要力量。教育能够通过增强妇女的主体地位、自主决

策与竞争能力以及降低出生率提高妇女的议价能力。

第一,教育增强妇女的主体地位、自主决策与竞争能力。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对妇女主体地位的含义的概括是:首先,“妇女是有着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福利状态的实体”;其次,妇女是具有选择权的人,即“她们是采取行动或拒绝行动的人,而且是可以选择以这种方式或者那种方式来行动的人”;最后,“她们还是负责任的人,她们必须承担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的责任。”人们一旦作出了选择,就要对其行为后果负责,“个人责任没有替代品”<sup>⑪</sup>。妇女所受的教育加强了妇女的主体地位,并且常常使妇女主体更加知情、更有技巧;<sup>⑫</sup>使妇女更具识别能力、判断能力和能进行主体决策。阿马蒂亚·森认为,与妇女的主体地位直接有关的变量是妇女识字和妇女参与劳动力队伍。<sup>⑬</sup>

妇女一旦获得了主体地位,便扩展了她的自由,增大了她的选择范围,她便具有了“可行能力”。阿马蒂亚·森认为,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因此,可行能力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或者用日常语言说,就是实现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自由)。例如,一个节食的富人,就摄取的食物或营养而言,其实现的功能性活动也许与一个赤贫而不得不挨饿的人相等,但前者与后者具有不同的“可行能力集”(前者可以选择吃好并得到充足的营养,而后者无法做到)。妇女主体地位的体现是妇女发展的目标和手段,这要求把自由的视角或选择权的视角放在中心。按这种视角,必须把妇女“看做是主动参与——在她们有机会时,成为她们自身前途的塑造者,而不是被动接受某些精心设计的发展计划的成果。”<sup>⑭</sup>

自18世纪开始的妇女运动起,女权主义者就最早争取和特别关注妇女的受教育权利。教育——特别是在批判思维方面的训练是影响社会变迁乃至改造社会最有效的工具。弗兰西丝·赖特和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共享着一个信念:缺乏教育导致妇女无法从诸多事实中领悟普通原理,而且使她们不能以批判的眼光分析她们自己的生存状况。批判思维能识破种种骗人的把戏,妇女正是因为受了骗才接受从属地位。<sup>⑮</sup>因此,“给予女人所有获得高等教育、充分发展各种才能的机会……给予女人一切机会,使她们从所有束缚、习俗、依赖、迷信,以及所有虚假的恐惧影响中彻底解放出来。这么做最充分的理由在于她自己的生命所具有的独立性和人的职责。”<sup>⑯</sup>

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教育被认为是度量人力资本的重要指标,是促进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原因。教育程度在男女实力竞争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影响着其他资源的获得和地位的划分。因此,提高妇女的教育程度,会增加她们在公共领域中的竞争实力,有助于扭转男高女低的教育程度差别,增进男女双方的福利。

第二,教育趋于促进生育率的降低。孔多塞是妇女教育最早的、最响亮的提倡者之一。孔多塞预见到自愿的生育率的降低,并且预言基于“理性的进步”将会出现较小家庭规模的新范式。他展望了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人们“将认识到,如果他们对未出生者承担一种责任,这个责任并不是给他们以生存,而是给他们以幸福。”这种理性思维,由教育,特别是妇女教育所支撑,将会导致人们生育率的降低和家庭规模的减小,而且,人们将会自愿地选择这样做,“而不是愚蠢地让世界塞满了无用的、不幸的生命。”<sup>⑰</sup>

正如雅克·哈拉克在《投资于未来》一书中所言:“哪里妇女教育搞得越好,哪里的家庭人数也就减少。发展中国家妇女教育在降低生育率方面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比男性教育的效果大两倍。”

出生率常常随着妇女主体地位的提升而下降。妇女主体地位的加强和妇女识字率的增加有利于减少死亡率。死亡率——特别是儿童死亡率的降低,趋于促进生育率的降低。这就构成了另一个渠道,通过这个渠道,妇女的主体地位(包括妇女的识字)起到帮助降低出生率的作用。高出生率有许多负面作用,其主要负面作用包括通过持续不断地生育、养育子女对许多亚洲和非洲妇女的实质自由的剥夺。

国内外的经验研究也表明,提高妇女受教育水平和降低总和生育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默西、吉奥和德热兹(1955)对印度的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表明,只有妇女识字率和妇女劳动力参与率这两个变量才对生育率有统计上的显著作用;印度妇女识字率与生育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sup>⑱</sup>在我国,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其终生生育次数可减少0.179次;如果妇女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5.57年,她的终生生育次数就能减少1次。<sup>⑲</sup>从实际生育子女数来看,我国妇女多胎生育是以初中文化程度为明显分界线的,这说明初中文化水平是使妇女生育率从注重生育数量转向注重生育质量的一个关键点。<sup>⑳</sup>

印度在社会事务方面最进步的克拉拉邦通过发挥妇女主体作用,非常成功地降低了生育率。虽然整个印度的总生育率仍高于3.0,但克拉拉邦的总

生育率现在已经降低到低于“替代水平”(2.0左右,大体上一对夫妻生两个子女)的1.7,这也比中国的生育率1.9低不少。而且,这是在没有任何政府强制的情况下取得的。<sup>⑪</sup>这与我们所能够预期的是一致的,通过那些有助于自愿减少出生率的因素的进步,出生率得到了下降。克拉拉邦妇女的教育水平高,对促成出生率的快速下降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克拉拉邦的成年妇女识字率(86%)高于中国(68%),而且,事实上,克拉拉邦的妇女识字率高于中国的任何一个省。<sup>⑫</sup>

因此,我们可以假设教育能够提高妇女的议价能力。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女性的议价能力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降低。<sup>⑬</sup>因此,我们得到下列命题:

命题3:如果教育提高妇女的议价能力,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教育降低妇女的劳动参与率。

#### 四、结束语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多数其他研究只是在制度方面讨论女性就业的历史背景、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经济转型过程中城镇女性就业地位和收入水平相对下降,被认为是作为妇女保护者的政府退出微观经济领域的必然结果。就业形势严峻是近年来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教育能够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本文从理论上论证了教育对妇女劳动参与的作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一定是妇女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参与率也越高。教育有促进女性参与市场劳动的一面,也有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一面。教育能够增加女性的工资收入,提高女性的健康水平,增加女性的预期工作时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能够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然而,随着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议价能力也会不断提高。这又使女性更乐于享受家庭生活,倾向不参与市场劳动。这个结论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女性的劳动参与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 注释:

<sup>⑪</sup>姚先国、谭岚:《家庭收入与中国城镇已婚妇女劳动参与决策分析》,载《经济研究》,2005(7)。

Grossbard-Shechtman, Shoshana A. and Neuman, Shoshana, 1988. "Women's Labor Supply and Marital Choi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6 (6), pp.1295-1302.

公式(1)、(2)的详细推导过程,参见2006年华中农业大学经贸学院郑美琴的博士论文《女性的选择权与劳动参与决策问题研究》的第六章。

庄平、毕伟玉:《教育与城镇妇女就业相关性分析》,载

《人口与经济》,2003(1)。

徐倩、谢勇:《健康与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比较研究》,载《市场与人口分析》,2004(1)。

Grossman, M., 1972. *The Demand for Health: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or Nber.

<sup>⑫</sup>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文版,189、284、190、195、43、215、189、22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sup>⑬</sup>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中文版,16~18、28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sup>⑭</sup>Murthi, Mamta; Guio, Anne-Catherine and Dreze, Jean, 1955. "Mortality, Fertility, and Gender Bias in India: A District Level Analysi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1.

<sup>⑮</sup>刘铮:《人口现代化与优先发展教育》,载《人口研究》,1992(2)。

<sup>⑯</sup>肖扬:《论妇女人力资本积累与可持续发展》,载《妇女研究论丛》,2003(4)。

<sup>⑰</sup>参见2006年华中农业大学郑美琴的博士论文《女性的选择权与劳动参与决策问题研究》的第六章。

#### 参考文献:

1.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文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 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中文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3. 郑美琴:《女性的选择权与劳动参与决策问题研究》,华中农业大学经贸学院博士论文,2006。

4. 郑晓瑛:《中国女性人口问题与发展》,中文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5. 姚先国、谭岚:《家庭收入与中国城镇已婚妇女劳动参与决策分析》,载《经济研究》,2005(7)。

6. 庄平、毕伟玉:《教育与城镇妇女就业相关性分析》,载《人口与经济》,2003(1)。

7. 徐倩、谢勇:《健康与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比较研究》,载《市场与人口分析》,2004(10)。

8. 刘铮:《人口现代化与优先发展教育》,载《人口研究》,1992(2)。

9. 肖扬:《论妇女人力资本积累与可持续发展》,载《妇女研究论丛》,2003(4)。

10. Becker, Garry S., 1965. "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 *Economy Journal*, 75 (September), pp.493-517.

11. Becker, Garry S., 1973. "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 (July/August), pp.813-846.

12. Grossbard-Shechtman, Shoshana A. and Neuman, Shoshana, 1988. "Women's Labor Supply and Marital Choi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6 (6).

13. Grossman, M., 1972. *The Demand for Health: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or Nber.

14. Murthi, Mamta; Guio, Anne-Catherine and Dreze, Jean, 1955. "Mortality, Fertility, and Gender Bias in India: A District Level Analysi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1.

(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经贸学院 武汉 430070  
湖南理工学院 岳阳 414000)  
(责任编辑:N、K)